

# 限考受荐：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

胡 坤

内容提要：“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受荐举改官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考限则是选人改官的基本资格。宋代的“限考受荐”原则在荐举改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不加区分受荐资格、磨勘资格到将二者区分明确，反映了宋代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剥离，有效地限制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的进身速度，同时平衡了宋代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安抚了未能改官的选人，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

关键词：荐举 考限 选人 改官 宋代

宋代选人（幕职州县官）受荐改京官无疑是宋代荐举制度中的重点，也是宋代士人最为关注的方面之一。学界于此亦多有论述，就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来看，已有的研究成果虽有涉及<sup>①</sup>，然而或语焉不详，或有所讹误，从对制度进行厘清的角度而言，仍有必要进行研究。另外，在宋代“限考受荐”的原则确立之下，其背后体现出国家怎样的意图，对于受荐改官之人及准备改官之人产生着怎样的影响，都值得正面探讨和深入研究。

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改官时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选人改官的资格就是限考受荐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选人改官的资格”，在宋代实际是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受荐的资格；一是磨勘的资格。宋代选人的受荐与磨勘资格，都是以选人所具备的“考”、“任”来标示。因此，在讨论选人改官资格之前，首先要明晰“考”、“任”在宋代选官语境中的意涵所指。邓小南先生于此论述到“虽然一般规定三考为一任，任数与考数似能依此折合，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差遣临时调易，官员因事离职以及员多阙少的矛盾等），考数与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只能分别计算。”<sup>②</sup>实际上，宋代“任”与“考”之间的关系远比上引所述复杂得多。以

① 参见〔日〕梅原郁《宋代銓選のひとつこま——薦舉制度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39卷第4号，东京，同朋社，1981年，第79—114页；朱瑞熙《宋代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文史》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88页；祖慧《宋代的选人制度》，《岳飞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61—488页；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4章，第103页。

“任”而论，不同差遣、职事官，其任期也不尽相同，二年、三十个月、三年、四年皆有之<sup>①</sup>。而“考”虽形式上为一年一考，然因“官员在任，除差出应副军期及河防危急等事外，应差出州界，每考通计过百日者，所余月日并不理为考任”<sup>②</sup>的规定，导致官员在任一年并不一定能够成考。这些都是造成“考”与“任”不能进行简单折合的因素。因此，也造成了选人改官所应具备考任的复杂性。清楚此前提，便可对选人受荐和磨勘时所具备的资格进行讨论。

## 一 受荐与磨勘的资格：从混淆到剥离

宋初，太祖、太宗统治时期，幕职州县官受荐改京朝官是通过特诏荐举得以实现，对改官人资格的要求在诏书中有明确提及。由于宋初刚刚经历五代离乱，统一战争仍在进行，需要大批的官员加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有关改官人的资格并没有过多限制。随着局势稳定，国家行政体制逐渐步入正轨，幕职州县官受荐改官也走上了制度化建设的进程，受荐改官也从临时性的特诏荐举变成了固定性的常程荐举。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诏书<sup>③</sup>的颁布正式将幕职州县官受荐改官纳入日常政治秩序，成为一项常规制度。

既然受荐改官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就必然会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保证制度能按照统治者的期望发展、运行。所谓“统治者的期望”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要保证制度能够回应现实的需要；二是对制度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有一定的预料，并在制度设计上尽量规避漏洞所造成的损害。显然，“限考受荐”就是承载着统治者这一期望的原则。

首先，它能够回应现实需要。在局势日益稳定、规范化行政成为朝廷政治运行主流的时代，稳步升迁是控制官员数量、调整官员结构、稳定官员队伍的有效手段。“限考受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稳步升迁的现实需要。同时，承平之际，官员的

① 如元祐年间，“秘书省官三年为一任，复置馆阁校勘。正字，四年成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〇元祐四年七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80页）；崇宁五年（1106）规定“川、广路牧守……并三十个月为任”（《宋会要辑稿》职官六〇之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南宋时规定“诸知州、通判、知县、监当人，内地川、广，并三年。及三京国子监、御史台并监当不系比较处，并三十个月。宫观岳庙，二年为任”（《吏部条法·考任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四七元祐五年八月乙卯，第10754页。另，宋太祖时曾规定“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九《选举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又据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三九《举魏沂》“勘会（魏）沂自嘉祐八年登进士第，初任河南府伊阙县主簿，方十个月，以臣奏举罢官，不成考第”的记载来看，大约北宋中期之前在任不满一年皆不得成考。

③ 《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戊午，第1664—1666页。

资历就显得比乱世重要得多，“限考”的结果至少能够保证其人有“功绪可稽”<sup>①</sup>。这与宋初出于填补阙员的需要，不大注重官员选任资格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其次，它对制度在未来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有一定预期，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预防。选人在受荐过程中，有无“贵援”的结果差别很大。有人援引，能够很快脱身选调，跻身京朝官之列；无人援引，就有可能终生沉沦选海，永无出头之日。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这一问题，以考任作为限制选人受荐的条件，就会使有背景的选人不至于快速受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抑权势的作用。正因“限考受荐”有如上作用，才使得其一经确立便成为两宋荐举改官制度通行不易的法则。

一般认为宋代“限考受荐”始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诏内外官所举幕职州县官并须经三任六考”<sup>②</sup>。南宋时的李心传首次提出“限考受荐至此始”<sup>③</sup>，后世学者亦多沿用此说法。此说虽不能轻言其误，但其间曲折之处，仍需考辨清楚。在此诏颁行不久前，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曾“诏群臣保举幕职州县官，不得举才经一任，及无劳绩者”<sup>④</sup>。“考”与“任”之间存在着相对折合关系，虽然“一任”并不能明确说出为几考，但此诏书的实质却和“限考受荐”相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两道诏书是在宋廷确立荐举改官制度化之前的行为，因此诏书中所言及的“举幕职州县官”是指特诏荐举。在特诏荐举中，举主为谁在诏书中有明确指向，且被举人一旦被举京官可以马上进入磨勘程序，故前引诏书中所说的考任既是受荐资格也是磨勘资格。因此，大中祥符三年规定的考任条件既不是首次提出受荐所需的具体考任，也不是单纯的受荐资格，以之为“限考受荐”之始，似乎多少有些勉强。

随着荐举改官之法日益严密，大中祥符五年（1012），“举主用两员自此始”；天禧三年（1019），“举主用五员自此始”<sup>⑤</sup>。当举主多员荐举一人改官之时，第一张举状（破白）和最后一张举状（合尖）之间必然会出现时间间隔，间隔的长短虽与被举人治绩相关，但在人治社会中更多是与被举人的关系网络和钻营能力相关。如果此时仍沿用大中祥符初年不区分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做法，显然对“孤寒”士人是极大的不公平。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相分离的要求就显得迫切起来。

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在什么时候被区分出来，史书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但关于其被区分的过程，仍可以通过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加以厘清。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时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的吕夷简上奏请求更革幕职州县官奏改京官制度，为此朝廷的诏书中曾提到“所举到幕职州县官，历任及四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四之三。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〇。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建隆至元祐选人升改举主沿革》，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47页。

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〇。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建隆至元祐选人升改举主沿革》，第747、748页。

考已上，并与勘会施行”<sup>①</sup>。“勘会施行”的内容与本处讨论的问题无关，姑且不论。从诏书中所用“举到”一词，及整个句子的文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幕职州县官历任四考以上并非受荐资格。联系到天圣二年（1024）监察御史李纘上言称“近年臣僚举奏幕职、州县官，例及五人以上及所举之人四考已上者，并得磨勘引见”<sup>②</sup>，及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所说“方天圣中，法尚简，选人以四考改官”<sup>③</sup>。天圣时与天禧元年相隔不过数年，由此可见，天禧元年幕职州县官“历任及四考已上”，乃指其磨勘改官的资格。至于此时的受荐资格为何，史籍中并未明载，但是从柳永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景祐元年（1034）柳永“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任官荐举法不限成考”<sup>④</sup>，“释褐到官才逾月，未有善状，而知州吕蔚遽荐之”，为侍御史知杂事郭劝所弹劾，认为吕蔚的行为“盖私之也”，为此朝廷专门下诏强调“幕职州县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荐举”<sup>⑤</sup>。

从此事的前因后果来看，郭劝所弹劾的重点在于吕蔚的“私之”，而非违反制度。由此可见，叶梦得所说“旧初任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是可信的。不过这里所提及的考任资格指的是单纯的受荐资格，而无涉于磨勘改官资格。因此天禧时的荐举改官制度，幕职州县官被举不限成考，亦即士人入官之后，在任何时候都有资格接受举主的荐举。这时的荐举改官法虽没有明确的受荐资格，却有了磨勘资格的限制，说明此时的受荐资格和磨勘资格已经出现了分离。

自朝廷专为柳永之事颁布明诏后，荐举改官法的受荐资格也明确了，即“初任成考”——幕职州县官在第一任上至少要成一考——方有被荐举的资格，历任四考以上且举主及格方有磨勘改官的资格。宋仁宗景祐二年诏书的颁布，表明荐举改官的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分离，同时还有了各自明确的考任条件，因此可以说此诏的颁布是荐举改官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稳定，被举改官者也日益增多，京官之阙却并没有因此而按比例增加，遂产生了员与阙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员多阙少的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控制被举人数，而提高被举人改官资格显然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有效方法。宝元二年（1039）六月，一封上奏成了宋廷推动此项更革的契机：

庚午，上封者言：“审官院阙有限，而奏举选人日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六。

② 《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六月戊寅，第2359页。

③ 《长编》卷二〇四治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第4957页。

④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⑤ 《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六月丁巳，第2736页。

官者。请自今复六考以上，方许磨勘。尝犯私罪者，加一考。”从之。<sup>①</sup>

引文所云“复六考以上，方许磨勘”，针对的是大中祥符三年“三任六考”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种“复”的行为，但究其实质，则完全不同。彼时的“六考”既是受荐资格，同时也是磨勘资格，而此时的“六考”则纯为磨勘资格，故南宋时的李昉认为“选人六考而改官实起于此”<sup>②</sup>。

选人的磨勘资格从四考增加到了六考，那么此时受荐资格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呢？史籍中对此并无明确的记载，故也不宜妄加推测。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景祐以后，对受荐资格有所更革的最早时间是在哲宗绍圣元年（1094），据史料记载：

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言：“选人初受任，虽有能者，法未得举为京官。而有挟权善请求者，职官、县令举员既足，又并改官举员求之。”诏历任通及三考，而资序已入幕职、令录，方许举之改官。<sup>③</sup>

从这段记载来看，朱勃所叙述的情况基本可以和景祐时初任限以成考方得举官的情形相衔接。然而这段话似乎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选人初任成考只能被举幕职、令录以循资，而不得遽为被举改官，所谓的“法未得举为京官”表明至少在绍圣元年之前，朝廷已经明令选人虽初任成考，却不得被举改官。而从景祐时对被举人“初任成考”的限制来看，其所要表达的意图是：选人初任成考后，举主可视其自身的能力与政绩或举循资，或举改官。显然，从景祐以后，朝廷对选人接受改官状的考任条件有了进一步的限制。可以说在景祐与绍圣之间，选人听举的条件亦被朝廷分出了层次：一是循资听举的条件（初任成考）；一是改官听举的条件（初受任，未得举为京官）。大约是因朝廷对改官听举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导致了“挟权善请求者”得以上下其手、有所施展。

从上引朱勃所言及后面的诏书来看，文字之间似乎有很大的跳跃，不免有莫名其妙之感，实际上朱勃此次上言亦有其他说辞：

绍圣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右司谏朱勃言：“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此处疑脱“以”）上，许奏举职官、县令；通及三考以上，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庶（此处疑脱“几”）稍抑权势请托之弊，均及寒峻效职之人。”从之。<sup>④</sup>

综合以上两段引文，朝廷同意了朱勃的建请，使改官听举的考任条件从制度上得以明确化，从而也使得循资与改官两种不同结果的“举”被“三考以上，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这一考任条件划分得清晰起来。至此，宋代选人改官的受荐条件与磨勘

① 《长编》卷一二三 宝元二年六月庚午，第2909页。

② 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官制门·荐举》，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九之一〇。

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八之二五。引文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

条件基本定型。

选人改官的考任条件一经定型,便被奉为成法,朝廷诏书对此在不同时期多次强调,使得此一规定愈加完备与规范。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朝廷诏云“初官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方听受监司、郡守京削之荐”<sup>①</sup>,对三考听举的条件加以强调。光宗时又接受了赵汝愚在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上章建言的意见,使听举条件更加细化,操作性也有所增强。史记云:

赵汝愚之帅蜀也,尝建言“旧法听三考,荐举改官者皆以三考为一任,举其成数而言,令于三考之外未罢奇零日内,辄敢并旁干请,已非法意。今又该遇覃恩尽行补转,若一并许于二考之外听举改官,切恐干进之徒与夫势要皆预得为他日计,而孤寒安分、廉耻自将者欲脱选调,愈不可得。欲望将选人一例许于第二任方得荐举改官,庶几仕进公平,不妨寒俊之路。”不报。上(宋光宗)即位,汝愚入政府,乃举行之。又诏“未成考人不以罪去者,于后任凑成三考,听举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听。”著为令。<sup>②</sup>

从赵汝愚的上书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问题:1. 选人初任满三考可以接受京官之荐在南宋中期已经得以全面施行,待改京官的选人已能较好地遵守;2. 出现对“法意”故意曲解的情况,所谓“于三考之外未罢奇零日内”有所干请,是指三考一任的情况下,虽考满,但接任官员尚未到任,其在“候替”的一段时日内求荐京官的情形;3. 遇到郊祀、封赏等“覃恩”的情况,朝廷往往会特别恩准一些不满三考的选人接受京削。为此,赵汝愚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选人三考得替,赴第二任之后方才获得“听举”的资格。

从赵汝愚及前文所引朱勃的建请中可以看到,他们要求明确“听举”考任资格的落脚点都放在了“抑权势”和“进寒俊”的层面上,但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随着“朝廷清明无事,慎惜名器”,敕举改官、考第改官、捕盗改官、登对改官等情况日渐稀少,使得“改秩无他,惟荐举一路”<sup>③</sup>,由此导致了赴部参选的选人日益增多,相应的改官员数亦随之增加;为了控制改官人数,首先要控制参选人数,于是才有了“听举”考任资格规定详尽的举措。

大约从绍熙四年(1193)朝廷接受赵汝愚意见并“著为令”后,至南宋灭亡,荐举改官的考任条件便一直沿用,而无大的变化。这从成书于理宗后期的《吏部条法》中可以明确看到。据该书记载:

初任已成三考赴第二任,方许受荐。<sup>④</sup>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〇之七。

②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绍熙四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页。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吏部条法·改官门》“侍郎左选尚书考功通用申明”,第224页。

应迪功郎以上，实历及一考，听举关升。已满三考，赴第二任，方许荐举改官（初任一考以上，不因罪罢，后任凑成三考，亦听举）。<sup>①</sup>  
此与赵汝愚建请之内容完全一致。另外，在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对三考听举、六考听磨勘的基本原则的实施做出了补充说明：

吏部措置下项：

一、选人两任六考，举主考第及格，任满得（赞）[替]，参部放行改官。如未差替人，除沿边州军合候替人交割，其余州军照已得替或未有替人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不候替人离任磨勘改官。

一、历任两任六考，至第三任如在半年内举主及格，须再满一年，方许赴部磨勘改官。如在任一年半，或二年举主方足，照第三任到官举主足日，已是过满一年以上，除沿边州候替人交割离任，其余州县并许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书离任，赴部磨勘改官。

一、两任止及五考，举主未及格，至赴第三任再成一考，凑成六考，而举主方及格，之后再需过一年。

一、已历两任未及五考，举主及格，止欠一考，至第三任及一考，考第足之后，再须满一年。

二项除沿边州军合候替人交割离任，其余州县许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书离任，赴部磨勘改官。今后如有避亲，并考第举主及格不候替人离任，须经本任州军监司陈乞，结罪保明申部，候符下方许放行，批书离任。若未得行下，州军等处使与批书离任，申奏取旨，到部官照擅离任条法施行，不许参选。奉圣旨：依。<sup>②</sup>

上引吏部措置之条款要而言之，分为三种情况：两任满六考，举主考第及格；两任满六考，举主未及格；两任虽满，然考限未足（此又分为举主及格与未及格两种情况）。对于这三种情形，除满足考任条件之外，都需要照顾到本身的任职所在。须候替者，交割之后方能离任；不须候替者，亦应由监司保明后申吏部，吏部根据任职的具体情况下发部符之后方能批书离任。由此看来，宋代限考受荐，并不仅对听举与磨勘的考任条件加以限制，同时还要求改官人不能因在任时间过短而影响本职工作。因此，才会规定除两任满六考，且考第举主及格的情况可以候替交割完毕或部符行下批书离任，剩余的几种情况，都需要在第三任上成一考或以上，方能离任赴部磨勘。这从对官员管理的要求和行政事务所需的层面上都是至为恰当的。在客观上，如此规定还可以延缓改官人赴部磨勘的时日，多少能够缓解每年参部赴选人数过多的压力。

以上讨论了“限考受荐”原则所包含的两个层面——听举考任条件、磨勘考任

① 《吏部条法·荐举门》“荐举撮要”，第243页。

② 《吏部条法·改官门》“侍郎左选申明”，第325—326页。

条件——在宋代从相互交织、混淆到逐渐剥离的过程。其间深刻地反映了荐举改官程式化后“员”与“阙”之间的矛盾，以及宋代统治者为缓解矛盾，尽可能使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所作出的努力。下文从宋代具体事例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 二 考限必六载：宋代的限考实例

宋代自仁宗时期规定了选人改官必六考方得赴部磨勘后，一直沿用到南宋灭亡。其间虽多有损益，然大的原则却保持着相对稳定。制度规定虽书于纸面，但其是否被切实遵行，仍要通过宋代具体之例证观察，方能对其有准确清晰的认识。故有必要对宋代具体人物从入仕到改官的过程加以探讨。有关宋人资料留存至今者虽不为少，然能清晰展现其从入仕到改官过程的人物并不为多。或进士高科径授京官；或以馆职跻身京朝；或以恩赏得为改秩；或虽自幕职州县循序改官，然其间行实已不可稽考。更兼若以“典型”求之，至为少矣！本文所选取的强至、徐鹿卿两位人物，其仕宦过程均自进士及第，自幕职州县官（选人）序为升改，其间行实清楚，皆有记载以为印证。且强至为北宋仁宗时人，是为听举、磨勘条件初为分离，且限以六考磨勘改官之始；徐鹿卿则为南宋理宗朝人，其生活之年代距宋亡不远，故可称之为“典型”。从“始”、“末”之间亦能观察宋代“限考受荐”原则之变化，从而对不同时期宋人改官的具体情况有一直观的认识。

### （一）宋代考限初步定型时的限考实例：强至

强至（1022—1076），字几圣，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终尚书祠部郎中，世以“强祠部”称之，有《祠部集》传世。其裔孙清人强汝询尝作《祠部公年谱》（上、下）<sup>①</sup>备载强至行实，可资参考。现削去强汝询之考辨文字，将《祠部公年谱》所记强至自入仕至改官阶段有关行实录之如下：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戊子，二十七岁，秋，（母丧）服阙，赴京就铨，授泗州司理参军，待阙于家。

皇祐元年（1049）己丑，二十八岁，九月自杭赴泗掾任。

四年（1052）壬辰，三十一岁，（在泗州司理参军任上）秩满，用举者九人，当迁县令，赴京候铨。

五年（1053）癸巳，三十二岁，授浦江令，待次于吴江。

至和元年（1054）甲午，三十三岁，春至杭州，遂赴浦江任。

二年（1055）乙未，三十四岁，在浦江。

嘉祐元年（1056）丙申，三十五岁，在浦江。秋，奉檄兼摄东阳令。

<sup>①</sup> 载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八，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江苏书局刻本。



四年（1059）己亥，三十八岁，在浦江满六考，举者及格，当迁，便道归杭州，遂如京师。

五年（1060）庚子，三十九岁，居京师待次。

六年（1061）辛丑，四十岁，遭父丧。

七年（1062）壬寅，四十一岁，居父丧。

八年（1063）癸卯，四十二岁，服阙，调开封府掾。

英宗治平元年（1064）甲辰，四十三岁，在开封府。

二年（1065）乙巳，四十四岁，转著作佐郎、知元城县。

强至自皇祐元年赴泗州司理参军任，四年任满积三考，用举者关升浦江令。至和元年春赴浦江任，嘉祐四年“在浦江满六考，举者及格”，遂赴京参部。然遇父丧，几经波折，方得改官。年谱中对于强至行实的考订大体与相关记载吻合，惟强至权摄东阳令之事与记载颇有抵牾，与宋制亦多有不合之处，以下试言之：

其一，所谓（嘉祐四年，三十八岁）“在浦江满六考”者，强汝询将赴浦江任当年亦计算在内，故得出强至在浦江六年，满六考之结论。实则，从宋制而言，在任满一整年方为一考，以此计算，强至即使嘉祐四年年底离任赴京，亦不满六考。

其二，强汝询“满六考”之说，所据乃强至《祠部集》卷二六《上提刑祠部书》所云“本朝著令：由县令迁京秩者，考限必六载。”此语在理解上是有歧义的。既可理解为从县令迁京官须满六考，又可理解为县令迁京官，须满足自入仕总计满六考。这两种理解孰是孰非？与强至生活年代大体相当的郑獬曾在一份奏状中回顾仁宗时县令改官的考任条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六考”加以理解：

初，仁庙时，患县令非材，不能通晓民事，故诏用荐者三人，方得选令。令

满三考，无过咎，又用荐者五人已上，乃得转京官。<sup>①</sup>

郑獬说得很明白，所谓“六考”是指入仕以来通计的考限。

同时，“权摄”之年月在宋代是否计考，也需考虑。南宋孝宗时，吏部侍郎叶颙尝上书云：

选人改官，依条：承直郎至修职郎用六考，迪功郎七考，举主应格，方许磨勘。近多嘱托吏史，为弊非一。自今并不许用迪功郎一色月日作六考，并用减年作实考，及权摄月日放行磨勘。<sup>②</sup>

朝廷“从之”。从这段话来看，权摄所历日月不得计考。然而，此为南宋之规定，且所云“自今不许”云云，亦说明之前这种情况大约是可以计考。结合强至的行实，他的一段“权摄”经历是否计考呢？

强至权摄东阳的时间并不如强汝询所云在嘉祐元年，强至《东阳九日寄浦江同

① 郑獬《鄮溪集》卷一二《论县令改官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四三。

僚》诗有“旅宦七年逢此节”之句，以乾兴八年授泗州司理参军日计之，此诗当作于至和二年，强至摄东阳至迟不晚于至和二年重阳节，且其在东阳日当一年有余。强汝询之所以认为强至摄东阳日在嘉祐元年是因强至在浦江《上提刑舍人书》云：“某官于穷山僻壤之邑，且二年矣”，“今考限垂满，而举者犹未足”<sup>①</sup>；《上运使卢工部书》云：“迄兹再考”，“惧荐章之弗及，伏望曲矜濡滞，亟赐甄收。庶使垂成之迹，免怀不满之意”<sup>②</sup>之文是在摄东阳之前所写，若强至摄东阳在至和二年，则在浦江“且二年”、“迄兹再考”则无从说起（至和二年强至在浦江仅一年）。实际上，从上引两书启中“考限垂满”、“垂成”之语判断，强至在浦江的任上即将考满（三考），故强至所云“再考”乃是不计权摄东阳之日月，仅算浦江之日月而得出。上引两封书启的写作时间当是嘉祐三年，在权摄东阳之后。

综上所述，强至嘉祐四年赴部改官时，在浦江积三考，通计泗州司理参军所积三考，其考任条件则为两任六考。

## （二）南宋后期的限考实例：徐鹿卿

徐鹿卿（1189—1250），字德夫，号泉谷，隆兴府丰城县（今江西丰城）人，尝为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卒谥清正，著有《泉谷文集》等，今不存。明万历时，其裔孙徐鉴辑鹿卿所散之文，得六卷并附录一卷，为今传世之《清正存稿》。

今本《清正存稿》附录《年谱》一篇，徐鉴编订<sup>③</sup>。徐鉴在《〈清正存稿〉序》中曾言此《年谱》系据家乘所编<sup>④</sup>，然《家乘》今不传，惟可从《年谱》之记载与现存宋人的记载是否相合进行判断。现将《年谱》所记徐鹿卿自入仕至改官阶段的文字择要以黑体录出。有史料相佐者，笔者将考辨文字述于《年谱》文字之下，以便参考。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春二月，试礼部，中第三等。夏五月，对策集英殿，敕赐进士及第，授迪功郎、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军学教授，冬十二月之任。

刘克庄《待制徐侍郎神道碑》（以下称《神道碑》）云：“擢嘉定十六年进士，廷对考中第（第）二，详定官摘语忌，欲抑之。初考官胡公梦昱争之不得，犹为第（第）十人。教授南安军。”<sup>⑤</sup>袁甫《甘夫人墓志铭》云：“嘉定癸未，廷试策，详定官以语触时忌，由亚魁降第十。”<sup>⑥</sup>

① 强至《祠部集》卷二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祠部集》卷二七。

③ 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3册所收《徐清正公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④ 《清正存稿》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蒙斋集》卷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乙酉，以登宝位赦恩循修职郎。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崩，理宗即位，“大赦”<sup>①</sup>。所谓“登宝位赦恩”恐指此。孝宗时，赵汝愚论及选人改官时有“该遇覃恩尽行补转”之语<sup>②</sup>，故逢赦恩选人循一资，恐为宋时成例。后文“庆寿赦恩”循资亦如是。然恐系年不当为宝庆元年，或恐赦恩至时已为宝庆元年。

宝庆三年（1227）丁亥，春三月满替离横浦。在任举主。是岁以举主考第及格，缴纳修职郎改作奏举关升县令，循从政郎，用南安军教授任满赏循文林郎。九月差充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

徐鹿卿《湛泉送客二绝句》其一云：“吾生如寄耳，岭趾又三年。政自归心碎，那堪送客船。”<sup>③</sup>又《林判府和前韵见示且约暇日论茗次韵为谢》有句云：“竟日陪衿纓，薄宦落横浦。师友皆豪英，寻胜得湛泉。”<sup>④</sup>南安军位于大庾岭北麓，故有“岭趾”之称，旧时于此设横浦关，故亦别称横浦。由二诗可见“湛泉”在南安军明矣。“三年”、“归心碎”二句则言三年任满将替之状。

绍定元年（1228）戊子，冬十一月之福建任。

《神道碑》云：“绍定初，盗起汀、邵，公为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

四年（1231）辛卯，夏四月以庆寿赦恩循承直郎。

《宋史·理宗纪一》载“以五月十六日为皇太后（宁宗杨皇后）寿庆节”。同书卷二四三《后妃传下》载：绍定“四年正月，（杨）后寿七十，帝（理宗）率百官朝慈明殿，加尊号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可知徐鹿卿循资之赦恩实为杨后七十整寿。杨后生于五月，理宗贺寿则在正月，当循转年即增一岁之传统。系于四月恐为赦恩至时之月。

五年（1232）壬辰，冬十二月考满。准部符，举主考第及格，不候替人离任，赴部改官。在任举主。

若徐鹿卿自绍定元年十一月赴任，则至五年十二月则满四年矣。《吏部条法·改官门》云：“考第举主及格不候替人离任，须经本任州军监司陈乞，结罪保明申部，候符下方许放行，批书离任。”《年谱》记绍定六年春正月，徐鹿卿已得改官。由此，是年十二月非考满之期，实乃离任之期。徐鹿卿当是满三考后等待州军监司陈乞申部、及候部符行下，方延宕至是年十二月离任。

六年（1233）癸巳，春正月，班改授奉议郎、知南剑州尤溪县。三月归自在所，曾大参制置江淮，辟公为属，以母老辞。冬十月泉州西山真公辟知泉州南安县。

① 《宋史》卷四一《理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84页。

②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绍熙四年三月，第30页。

③ 《清正存稿》卷六。

④ 《清正存稿》卷六。

《神道碑》云：“（绍定）六年，改秩，知南剑州尤溪县。真公守泉，以南安久不治，乞公于朝，改知南安县。”真德秀《申南安知县梁三聘劄》文后“小贴子”云“窃见奉议郎、新除南剑州尤溪县徐鹿卿材识不凡、强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县。”“小贴子”后注文云“十月十日，奉圣旨依……徐鹿卿差知泉州南安县，填见阙。”<sup>①</sup>

由以上文字可见，《年谱》中虽有若干行实不可考，然凡能考辨之行实与史实大体相吻合，且《年谱》中所涉及宋时典章制度及相关术语均与宋代实际情况相合，故该年谱所记徐鹿卿之行实大体可信。

《年谱》所述徐鹿卿行实，一任南安军学教授，任满赴第二任时，其阶官已自迪功郎循至文林郎。虽然从初任满替至再任赴任之间延宕一年半多的时间，然赴京就铨、待阙，所费之时日亦属正常。再任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满考后，以不候替人离任，赴部改官，此亦节省了大量时间。兼之，其间又碰到杨太后的庆寿赦恩得以再循一资，达到了选人的最高阶——承直郎，改官时也由是越过京官，径改朝官之奉议郎。

在对强至和徐鹿卿的改官过程有所了解之后，不妨将两人进行一下对比：

对于强至，若除去因父丧导致改官中辍不论，其第一次赴京改官时的考任是两任六考，刚好符合改官的资格。考限对于强至的改官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考限的限制，强至的改官进程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强至自己曾提到：“本朝著令：又县令迁京秩者，考限必六载，举者必五人。某必六者既五矣，必五者既四矣”<sup>②</sup>。由此可知，即使没有考限，由于举主不足员，强至也不可能在六考前得以改官。因此有无考限，至少在改官所需时间上，对强至是没有影响的。其得以六考满替，举主及格，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与人书，颇有求知之辞”<sup>③</sup>而获。

对于徐鹿卿则不同，据刘克庄《神道碑》载：徐鹿卿“幼强记能赋……经子皆手妙（抄？）口诵，以己意折衷诸史……挥翰如飞，若不思索，自然藻丽。里中子弟皆师焉。”少有乡曲之誉，科场一案使其声名徒增，教授南安军之所为又契合理宗朝崇尚理学的潮流，为理学名公所激赏。此种情形之下，举主及格于徐鹿卿而言则不为难事。由此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考限的存在，徐鹿卿或可在两任六考前得以改官。显然，对于徐鹿卿而言，考限是横亘在他迅速进身之路上的一道障碍。

面对以上的对比结果，在此不禁要问：宋代在选人改官制度中所设立的考限到底限制了谁，考限设置的目的又在于何？

①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祠部集》卷二六《上提刑司封书》。

③ 《求益斋文集》卷八《祠部公家传》。《祠部集》中所载诸如《上提刑祠部书》、《上提刑司封书》、《上提刑舍人书》、《上运使卢工部书》等书启，皆是其为求所知（荐举）而写。

### 三 考限的意义：限制与平衡

从前文对强至和徐鹿卿二人改官经历的叙述及分析来看，考限的存在显然限制了如徐鹿卿一般才具优长的选人。但被限制的绝非仅此一类，那些在朝中有“贵援”、自己能“奔竞”的选人，在没有考限限制的情况下，亦可得以倚仗“权势”的作用迅速改官。像强至之类虽有才能，但并非出类拔萃，又不能攀附权贵的选人，固可凭自己的劳考得改京秩，然所熬之年限或与考限相若，或超过考限，对于他们来说，考限存在与否，对他们改官迟速是不构成影响的。至如“龌龊冗懦之辈，既无材可以被荐，又无过可以斥逐”的选人，朝廷“宁予之幕职、曹掾之禄，使足以代耕”，让他们“至于没齿而不敢望致身于京官”<sup>①</sup>，可以说考限存在与否根本就与这些人无关。

考限作为宋代荐举改官法中的一项刚性制度，虽说它横亘在每个选人的面前，但只有对于才具如徐鹿卿之辈及那些朝中有贵援、自己能奔竞的选人来说，才能称之为“限”。而在这些为“考限”所“限”的选人中间，考限设置的目的更多是体现在有贵援的势要子弟和能奔竞的攀附之徒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改官的成功依靠的都是“权势”，只有越过“考限”这条界线，“权势”才能发挥其力量。若无考限的存在，每年大部分的改官额可能都被势要子弟和奔竞者所侵占，而考限存在就会使一部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不符合最基本资格，从而空出部分改官名额。如此一来，部分孤寒子弟就能凭借自己的才干跻身京官。虽然势要子弟和奔竞者总是能够得以改官，但考限的存在，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推迟了他们的进身速度，避免更多的改官名额在同一时间为其所侵占。这也就为“孤寒”的“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从帝国的需要来看，“权势”是现在的统治力量，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是能量巨大，不能妥善地照顾他们的利益，国家的“政治安定”就会出问题；有才具的“孤寒”是未来统治所需倚靠的柱石，官僚队伍要长久保持其应具备的功效，必须要有新鲜血液的进入，才能使官僚队伍具有活力，这也是国家“政治安定”的一部分。从“安定”的角度出发，以上的两种状况都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作为国家的行政政策，其必须保证既能妥善处理“权势”的利益，同样也要照顾到“孤寒”的意愿，而不能有任何倾向性的偏倚，否则“政治的不安定”就会出现。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愿看到的。

显然，考限的存在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考限对于“权势”来说，只是推迟了他们进身的速度，却并没有阻碍他们的进身之路，这样的“损失”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而对于国家需要“进孤寒”的长治久安来说，考限所提供的缓冲空间，

<sup>①</sup>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秋七月壬寅。

为更多的“孤寒”提供了进身之阶。由此，考限成功地平衡了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

考限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的存在还成功地安抚了“老死选调”的选人，平衡了他们的心理，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国家在考限的问题上，做足了“抑权势”、“进孤寒”的姿态，在实际效果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进孤寒”，在改官的实例中，一批“孤寒”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京官，甚至登庸拜相，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姿态和实际效果提供给选人们一个直接的暗示：只要自身足够优秀，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其潜台词则是如洪遵等人所说的“龌龊冗懦之辈，既无材可以被荐，又无过可以斥逐，宁予之幕职、曹掾之禄，使足以代耕，至于没齿而不敢望致身于京官。”话虽然说得有些决绝，但道理上却并无不妥。“老死选调”只能归结于自身的“龌龊冗懦”或是时运不济，国家藉此轻轻地抽身而去，留下的是选人对“老死选调”的自怨自艾。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宋代荐举改官的文书”（201004701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胡坤，198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科研人员）

收稿日期：2010年7月7日

欢迎订阅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